

韩树英 主讲

哲学与改革

ZHIXUE
YU
GAIGE

洛阳市哲学学会

B-53

B-53

4

哲 学 与 改 革

韩 树 英 主 讲

洛 阳 市 哲 学 学 会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 洛 阳

目 录

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哲学问题·····	韩树英(1)
党的思想路线与经济体制改革·····	陈瑞生(23)
谈谈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问题·····	陈瑞生(55)
思维方式与体制改革·····	吕英寰(83)
社会基本矛盾与体制改革·····	阎树森(108)
社会意识与体制改革·····	宋惠昌(129)
学好哲学 用好哲学·····	韩树英(158)
关于党校教育正规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学问题·····	韩树英(182)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	吕英寰(260)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	阎树森(309)
编后记·····	(325)
附录: “哲学与改革” 专题论文目录索引·····	(326)

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哲学问题

韩树英

同志们：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随艾思奇同志来过一次洛阳。这一次应洛阳市委的盛情邀请，在外出开会之后又转道来到洛阳，主要是向洛阳的同志们学习各方面的好经验。我对当前实际工作里的情况了解得很少。今天到会的不仅有我们哲学界的同行，还有很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所以，我今天讲话恐怕难以满足大家的要求。只想和大家交换一些意见，想了这样一个题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哲学问题》。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仅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而且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我国实际，科学地回答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般理论基础，《决定》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那么，它也必定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哲学思想问题。所以，我们作哲学工作的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考虑一下，《决定》中包含有什么样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里我想和大家就这个问题交换一些意见，我想，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的动力的角度来谈谈

这个问题，它涉及到许多方面。如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涉及到唯物辩证法，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今天我想分三个问题，谈一谈我学习的一些初步体会。

一、经济体制改革和认识论问题

认识论问题，就是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首先来看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社会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它和经济体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根据我的理解，所谓经济体制，就是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是在某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的一定形式。

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在解决了后者的固有矛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最基本的矛盾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就是说，在它内部是不可克服的。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另外的矛盾。其一，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其二，在阶级关系上又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矛盾虽然现在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它的实质并没有变化。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一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这是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在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基础上，为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

的劳动生产率,为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初步地显示出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正象《决定》中讲的,由于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所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间;还没有能够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前面说过,经济体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把经济制度体现得好,也可以体现得差一些,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体现得就差一些,改革经济体制就成了我们面临的历史性的任务。

现在我们要改革的经济体制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说,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

我这里说的是城市里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有如下特点:第一,国家机关是管理经济的主体,企业只是国家机关的附属品,几乎一切权利都集中在国家机关手里,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没有经营自主权;第二,经济的管理又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基本上不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第三,整个经济活动是靠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的,排斥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基本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

苏联的经济体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有过设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就要排除商品生产和货币的作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讲过,在未来的社会里,不必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产品变成为商品,体现为价值,拐弯抹角地来证明自己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个设想形象地来说是个什么样子呢?可以这么说,整个社会是个大工厂,整个社会是个大仓库,全社会组成这

么一个大工厂，有计划地搞生产。现在的企业呢，都是这个大工厂的一个分厂，车间、工段，甚至是班组。工厂里车间、工段、班组之间是不用货币来交换的，不实行商品交换。这个社会又是一个大仓库，人们干完了活儿以后，就靠证明自己提供了多少社会劳动时间的证券，在仓库里领取自己生活的消费资料。他们是这么一个设想。总之，不是商品货币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这个设想到底对不对呢？理论上讲是对的，未来总有一天达到这一步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第一，要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第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的程度也有巨大的发展；第三，也要有各个经济组织的联合程度高度的发展等。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采用这样的体制，经济也不能有效地进行。但是，现在能不能这样做呢？现在不能这样做。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弊病出发，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但是这种社会的实现有待各种具体条件的成熟。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经过新经济政策。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是主张实行商品经济的，因为那时有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不都是公有制。那以后，从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这个经济体制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工业化时期，农业集体化时期，高度集中，国家统收统支，便于建立新工厂，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到五十年代末，随着从外延式经济向内涵式经济的提高，就是从工厂一个一个量的增加，到要求工厂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经济体制的毛病就逐步显露出来了。不仅是苏联采用这种经济体制，后来东欧那些国家都学苏联采用这种经济体制，经过一段时间，普遍感到

存在问题，关键是企业没有多少自主权。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用我们的话讲叫做产销不对路。企业的产品是不是市场需要的，企业无权过问，也没有办法解决；二是企业不能有效应用国家的投资，经济效益不高。所以从五十年代末起，苏联和东欧国家就开始探索经济体制的改革。六十年代是高潮，七十年代是进一步深入。由于各国情况不同，他们的做法也不完全一样。这就出现了所谓各种各样的模式。有所谓苏联的模式，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他们更早就开始改革）等。有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改革进行了一段以后，赶快又回收，经过了曲折的发展。有的从理论上提出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的程度很不一样。我们现在这次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考虑到吸收各方面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的管理经验，是相当完整、相当彻底的。当然我们要非常坚决，又非常谨慎地来从事这场改革，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这里边有些问题，理论上还要进一步探讨，有些问题在理论上解决了，在实践中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还需要摸索。所以，不能草率从事，一哄而起。

从这个历史发展过程里，我们谈一下经济体制改革和认识论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常有只作怪的“大公鸡”。什么叫“大公鸡”呢？就是对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大、二公、三急（鸡）”，这就变成“大公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回想一下，我是五八年经过洛阳，在登封呆了八个月。当时大炼钢铁，我们那时的头脑是多么热，群众热，中央领导也热。很快就搞了公社化。北戴河会议说，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快则

三几年，慢则四、五年就可以做到了，而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今天听起来是笑话，可是当时我们都相信了。随后一系列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逐步落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它的“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后来又学大寨，粉碎“四人帮”以后是不是就完了呢？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我七八年就到了一些地方，有一个省两个县搞穷过渡，十天之内要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结果老百姓杀猪的、杀鸡的、砍树的，什么都有，因为一过渡什么都不是他的了。最后这个“大寨县”就出现了一些讨饭的。这个根子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断，这不是一只“大公鸡”在那里作怪吗？从中得出什么教训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遵循这样一条思想路线，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参加工作，参加革命，脑子里有个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总觉得我们离共产主义越近越好。但是不在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而在生产关系的改造上下功夫。有人开玩笑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头去了。我想从认识根源上来讲，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没有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国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原来苏联的那个模式大家照着学，也是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以，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认识论上讲，也是一个主观如何符合客观的问题。我们主观建立的经济模式，经济体制，怎么样符合客观实际，基本理论怎么样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归根到底，这里边有一条规律我们应该遵

循，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经济体制就是生产关系基本形式的具体化，它也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不这样就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就要使经济失去它应有的活力，这是我们从认识论上总结的一个教训。

今天在我们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时候，这个认识论问题仍然要十分注意。我们贯彻中央的《决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解决，都要求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前一阵子许多单位出现了“小红包”的问题，不知河南有没有。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人也是所谓解放思想，就学“小红包”。这个“小红包”据说是从日本香港来的，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旧社会其实也有。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办法。这个“小红包”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是经理送下边，现在我们这里有的地方还倒过来，下往上送。不能这样干，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这个企业的主人，主人让人家当成伙计怎么行呢？这个“小红包”能不能起一定的作用？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既然大家用了，估计一定能起一点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场合，大概能起一点作用。有人可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小红包”有用，对发展生产，调动人们积极性有好处，它不就是真理吗？但实践检验真理还有个辩证法，我们所说的实践是历史的、全面的、广大群众的实践。什么意思呢？有些事情在一时看来是可行的，长期看来不见得可行，我们历史地检验，全面地检验，就是说，在某些局部看来可行的东西，在全局看来未必是可行的。群众性的检验，就是说某个人，某个领导看来，一时觉得有点效果，

但不能作为标准，只有群众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所以不能找借口，不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采用“小红包”。现在第二期整党加上一个新内容，就是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心里有点不大痛快，有点牢骚。我发了两套厂服被说成是不正之风，某某先进单位介绍经验，不是说也发了厂服吗？我不就是照他学的吗？还有多发奖金等问题，也有些说法。现在报上有个提法，叫要纠正不正之风，同时又要保护经济改革的积极性，不要挫伤它。什么叫做不正之风，什么叫做正常经营行为，这里边是有些界限要划的。当然，有些事情可能看得比较明显，有些事情划起来可能有些困难。但是这总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凡是谋私利的，谋小集团利益的，不顾国家，不顾大局，不顾长远，那就是不正之风。这一点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划清这个界限。总之，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间，会遇到一些问题，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界限是可以划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归根到底，就是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进一步说，我看就是它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不能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作用。

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说到底，它究竟靠什么东西推动，怎样才能发展得快一点，怎么样才能发展得顺畅一点？什么是它的内在动力？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哲学的道理上来考虑一下。

刚才说，什么事情的发展，都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推动它。充分地把这个动力的作用发挥出来，它运动发展就快，否则发展就慢，讲辩证法要讲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是事物的内在矛盾。这话比较空，但也比较原则。可以说，经济领域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要靠哲学观点来帮助。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执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从哲学思想上理解得比较准确，比较深透，那么贯彻执行起来自觉性就会高一些。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呢？我们先看看资本主义。依次不同的每一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具有发展生产的不同目的，不同动力。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一句话，为了利润。这个动力很厉害，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讲过，封建主发展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他的胃口**。封建主的胃口毕竟是有限的。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追逐利润这种动力是无限的。没有听说哪一个公司的老板说我的钱赚够了。资本主义追逐利润，从它的趋势来讲是无限的，从它的实现来讲又是有限的。我们的青年不理解，去年有一个报道，欧洲共同体市场柑桔过剩，花了多少亿美元，雇人、出运费把大量桔子埋掉，以便维护桔子的价格。咱们有的小青年说怎么搞的，分给大家不就完了吗？不可能的，资本家得不到利润是不干的。正因为得不到利润他不干，又给他提供了局限性。我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动力是什么呢？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我们不断改进技术，发展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简单说，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发展生产的动力。生产的发展，满

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高的要求，又推动我们去发展生产。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向前发展。这个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比较起来，至少有两个不同：第一，这个动力，这个目的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不是为资本家的私利服务的，可能激起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作用，不会在哪一点，哪一个地方限制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那个无限性的趋势和有限的实现来比，我们这个动力是无止境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他有点担心，担心将来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了以后，不是就懒了吗？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使劳动成为生活的需要，成为一种乐趣，不劳动就难受。对此，恩格斯讲人们的需要的资料可分三种：①基本生活的需要；②享受的需要；③发展的需要。所以不会象傅立叶担心的那样，好象有了吃，有了穿，有了温饱就够了。其实傅立叶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将来的共产主义，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是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动力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我们强调了其中的两点。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这样，我们是依靠它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特别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动力应该体现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所有经济组织身上，而不能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制度、政策上，这样才能充分地把这个动力作用发挥出来。第二，这个动力作用的发挥，要贯串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些经济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中。因为，这四个环节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所以这一动力应该完整地体现在它们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相适应都影响整个动力作用

很好地发挥。

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定》中讲有一条就是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结果形成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刚才我讲到，要使动力发挥作用，必须注意两点，四个环节。现在，我们看一看分配这个环节。吃两个大锅饭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配平均主义，这使得分配不能反作用于生产。恩格斯讲过这样的意思，推动生产的最好的分配形式是能使人发展自己的能力，运用自己的能力。保持自己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分配形式。就是说分配要能反过来影响生产，推动生产。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也有个辩证法的问题。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呢？即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物质利益原则。什么是辩证法的问题呢？即辩证法讲矛盾是动力，不是一致是动力。现在先说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我们的生活主要是靠工资、奖金。我们到市场买东西都要货币，而我们的货币来自工资、奖金，工资、奖金又是哪里来呢？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即按劳分配来的。我们职工积极生产劳动无非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运动。我们都不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都是要劳动报酬买东西，取得消费资料。这个道理很浅显，但是很长时期，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特别是五八年和“文化大革命”中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思想搞乱了。搞政治挂帅，批物质刺激，批物质利益。说到按劳分配，不是就问道：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谁给你多少奖金啦？也有一点道理，哪一个革命先烈是用奖金买来的！？但是，这个想法是片面的。革命先烈、革命战士搞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使人民生活幸福、

美好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劳动成果不被剥削者剥削，付出的劳动越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越快。所以，那个说法是片面的。这是讲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就要讲物质利益，讲经济的动力。同时还要讲辩证法，平均主义是形而上学思想，它要的是大家都一样，奖金谁也不好意思多拿，每个人都七元钱算了吧。辩证法是讲矛盾的，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一致条件下还有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我们要承认劳动者在技能、责任心上还有差异，劳动效果不相同，正确利用这个矛盾，可以促使劳动者竞相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提高生产效率，这样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决定》中讲，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职工的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的消费逐步有较大的增长，等等。可以认为，归根到底都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都是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强调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的消费逐步有较大的增长。最近，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讲，艰苦朴素，勤俭建国。消费、分配反过来影响生产，但是超过了生产发展的程度，分配、消费就不起促进作用了。

过去经济体制严重的弊病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情况，整个社会好比是个大工厂、大仓库，每个工厂企业都是车间、班组，在现在条件下片面地加以理解就很容易造成企业间的平均主义，企业吃国家的大锅

饭。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物质利益的原则，这一原则要不要应用到企业这个层次？职工个人的消费品要实行按劳分配，这一点在理论上马克思早已解决了。问题在企业，企业是个劳动的集体，要不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也运用到劳动集体企业的活动上来？《决定》中讲，我们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的活力。（前已讲过）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讲过，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个人民内部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毛主席着重讲的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没有系统提出在经济方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在经济方面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所以《正处》中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要靠内在的动力，这不仅要体现在职工身上，而且要体现在职工集体活动的企业里。应该承认企业之间活动有差异，它们之间的经营成果有差异，这种差异应该在企业的经济利益上得到相应的体现，从而推动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总之，在企业这个层次上，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问题。在承认矛盾是动力的问题上，是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决定》中提出，为了增强企业活力，要把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使生产型的企业转变为经营型的企业。《决定》又规定，今后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要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

这些都为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直接变为企业的动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这两个大锅饭在职工身上就是双料的大锅饭。为什么这样说呢？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又吃国家的大锅饭，这样物质利益原则运用到职工身上，在企业这一关上就堵塞不通了。物质利益原则，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上面我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讲了一下这种内在发展动力怎样通过物质利益的原则，通过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体现为职工和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这些是物质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只讲经济的动力，不讲非经济的动力？只承认物质的动力，不承认精神的动力？不是的。只靠物质的动力要出毛病，特别是把物质的动力、物质利益理解为眼前的个人的利益，除了钱，其它就六亲不认，这可就要出毛病。要发挥精神动力的作用，这个动力是不可少的，不讲这个动力，就是片面的，要走到邪路上去。讲物质的动力，又讲精神的动力，这不是矛盾吗？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东西是基础，精神的东西是在物质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作用于物质。这两个东西不能背道而驰。我们所讲的精神动力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了我们长远的、全局的根本性的利益，如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为中华的振兴而奋斗，发挥国家企业主人翁的自觉性等。与人们的物质利益背道而驰，完全对立的精神鼓励和宣传，最终是不起作用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